

17世纪欧洲巫术迫害心理成因考察

孙义飞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欧洲在延长的17世纪(1580—1700)曾发生了一场针对巫术的迫害运动。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有着复杂的发生机制,而心理成因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的心理暗示;社会变迁带来的替罪羊心理;日常生活摩擦引发的拒绝—内疚等心理因素构成了巫术迫害的主要心理成因。

[关键词] 巫术;巫术迫害;心理;延长的17世纪

[中图分类号] K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1)01—0084—05

社会变迁常常引起破坏和行为方式的重组,并要求对价值观、态度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和重构。在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17世纪,西方文化领域展现了其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尤其是被视为“幻想与现实之间变迁的空间”^{[1]379}的神秘术依然盛行并运行在乡村社会关系网中,由此也导致了西方历史上极为黑暗和血腥的一幕,即针对巫术的迫害运动。笔者以为这场巫术迫害有着独特的心理成因,拟就其进行考察,以就教方家。

1580年前后,欧洲展开了一场针对巫师的狂热迫害运动。其后百年里,巫师和巫术诉讼案件和指控大量涌现,波及区域广大,大批巫师入狱,遭受剥夺睡眠、水刑、锥刺、鞭笞等严刑拷打以及游泳等非法测试,许多人被处决。据统计,整个迫害过程中,受害者为数众多。如在苏格兰,长老会承认烧死约4 000人,1891年的一篇文章公布:1590—1680年间烧死3 400人;1938年,乔治·布莱克估计死亡总数为4 400人并列1 800个女巫之名^[2]。德国受害者数字庞大:维尔茨堡主教菲力普1623—1631年烧死900人;班贝格主教建立了一个女巫专设监狱,1609—1633年公开处决900名巫师;17世纪30年代德国科隆处决2 000人;1609年波尔多法院辖境处决600巫师^{[1]342、[3—5]}。此类案件不计其数。

教俗部门对此推波助澜。如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在1597年发布《魔鬼研究》,英国詹姆士一世1604年颁布了巫术法令。据统计,对女巫最凶残的10个迫害者都是天主教的王子大主教,其中包括巴姆堡和沃尔兹堡王子大主教、特里尔王子大主教、3个美因茨公爵和来自科隆维特尔斯巴赫王室的斐迪南公爵等。在新教地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及其顾问在1617年进行了道德改革立法,其中一些

[收稿日期] 2010—11—20

[基金项目] 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NENU—SKB2007007);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校内青年基金项目(09QN006)

[作者简介] 孙义飞(1979—),男,江苏新沂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新条款即针对巫术。比利时和卢森堡 1592、1595、1606 年法案也将巫术界定为反道德、迷信和无秩序的。巴伐利亚大公威廉五世、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等君侯也积极参与。此外，一些地方法庭、官员和社会精英，如法国著名思想家让·博丹等也积极参与并发表臭名昭著的作品《巫师的魔凭狂》。一时间，怀疑巫术存在的人远不及信仰巫术者人数众多。

与此同时，巫师及其形象在这一迫害过程中也经典性地符号化，那些地位低贱、老、病、残、妇、鳏寡孤独、被孤立的、不受大家欢迎的、不生育的社会边缘人、邻里关系不好乃至外来者，具备上述特征，尤其是多项特征者，一旦不幸发生，其就会成为特定者，理所当然被视为巫师。赫特福德郡的牧师约翰·高卢 1646 年就表示：“如果一个老女人长着一张有皱纹的脸，眉毛处看起来像羊皮，长着有软毛的嘴唇，尖牙，眼睛斜视，具有尖利的嗓音或者如同责骂人一样的音调，身上穿着有皱纹的大衣，头上戴着便帽，手中拿着棍棒，并且有一只狗或者猫在她旁边，那么她就不仅仅是怀疑，而是要被宣布为女巫了。”^[1]¹⁷

巫术迫害持续时间长久，在法国，直至 1682 年路易十四颁布法令后，官方审判巫师才停止。在英国，前述巫术法令直至 1736 年才被废。但针对巫师的私人暴行并未完全停止。不时出现的巫术迫害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近代早期西方文明的浮躁与不安。

二

巫术大迫害为何在此期间盛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其有着独特的心理成因。

首先，传统文化的心理暗示早已让西方人在心理上习惯了巫术或准巫术形式的存在，并在心理上将迫害巫术行为视为神圣事业。

虽然巫师和巫术只不过是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产物，但它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曾广泛存在于欧洲各地。在传统基督教宗教仪式中我们可以清楚找到它存在的身影。如圣餐礼的神秘效力，就可以看到巫术思想和基督教思想的某种融合。以面包和葡萄酒来代表基督的肉和血，通过饮服来达到某种神奇效果，这本身就是顺势巫术的一种标准表现形式，而这种杂糅巫术思想的圣餐礼在宗教改革时期自然遭到强烈抵制。同时，随着基督教广泛传播并从其教义中衍展出一种二元论：善之源的上帝与恶之源的撒旦，二者在人间都有代理人。这让欧洲人非常相信某些人具有非比寻常的超自然力。如作为上帝人间代理人的英、法等国王据说拥有广泛存在的“国王奇迹”：通过触摸治愈某种疾病的能力^[6]。而为了对抗上帝，撒旦也在人间以魔法和各种物质利益招募助手为其服务，对人世进行破坏。巫师是其助手，他们同样具有超自然能力，能够影响人类事务，带来灾难与痛苦。如著名神学家奥古斯丁就认为任何巫术都是基于魔鬼的帮助^[7]。而背叛上帝投身魔鬼本就是大罪，这一观点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迫害行为在一些人看来就变成了神圣事业，旨在消灭那些罪恶之人并将其灵魂从魔鬼处拯救出来。

而在迫害女性的心理方面，把女性看作是罪恶之源，声称女性是生理上不完整的男性或女性就是诱惑男性之物等消极女性观一直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占有主导地位的心理观念。17 世纪这种观念大大强化了，形成了与男权的强烈冲突，由此导致了一部分男性对女性的疯狂迫害^①。

其次，社会动荡而在民众中引发的寻找替罪羊的歇斯底里式的集体心理。

替罪羊理论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遭遇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自然科学研究显示，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欧洲小冰期(the Little Ice Age)的最冷时段在 17 世纪^[8]。这一时期，气温平均下降 1—2℃，气候变动对人类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气温低，冬季延长，冰雪化冻晚，而秋季来得过早，致使耕种季节短暂；夏季温度偏低而多雨，农作物成熟时间大为延长，对此，帕克指出，小冰期气温下降 1℃将使“作物的生长适宜期缩减 3 至 4 周”^[9]，瓦茨也指出：“夏日平均气温的些微下降可能导致谷物成熟可利用时间减少 2—3 周”^[10]。而“冷湿天气意味着较短的农业周期，反过

^① 关于男权、巫术迫害与女性的关联请参见：Jonathan Barry etc. eds.,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udies in Cultural and Belie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eborah Willis and Malevolent Nurture, *Witch-Hunting and Maternal Pow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Merry E. Wiesner,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Lawrence Ston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9; Christina Lerner, *Witchcraft and Religion: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Belief*,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来,就意味着收成减少,农业歉收和广泛饥谨。”^[11]受此影响,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西班牙中部从16世纪90年代起及随后几十年中,产量下降30%—50%,法国从17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早期,产量下降20%到40%,德国也经历了巨大损失^[12]。

随之而来的是饥荒、瘟疫和流行病肆虐。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指出17世纪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充斥的一个可怕时代,饥荒、瘟疫再次席卷欧洲^[13]。纳什列举了1580—1720年发生的19次大饥荒、瘟疫^{[14]598-599}。这还不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性饥荒、瘟疫。布罗代尔指出,仅法国西南就于1628、1631、1643、1662、1694、1698、1709、1713年发生灾荒^{[15]82}。流行病和瘟疫雪上加霜,仅法国安茹1583—1707年就发生瘟疫5次^[16]。对于瘟疫,尤其是鼠疫频发,布罗代尔曾指出:“作为16世纪史的专家,我很久以来一直对17世纪鼠疫在城市的危害感到惊讶;无可否认,下一世纪的情况比前一世纪更加严重。”^{[15]98}瘟疫夺去了大量生命,据统计,伦敦5次鼠疫就死亡近16万人;法国1600—1670年间瘟疫夺去220—330万人生命^{[15]98-99,[17]}。剩下的人口也处于普遍贫困之中,流民横行。英国仅1631—1639年,37个郡的档案就载有被捕流民2.6万人^[18]。贫民为数更多,奇波拉指出,英国直至17世纪末穷人仍占一半,其中一半过着极度贫困生活;法国也有5/9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德国科隆每5万中就有2万是乞丐^[19]。此外,宗教斗争、政治动荡、经济停滞乃至倒退等让西方人的生活和个人安全水准在此期间急剧恶化^[20]。社会无序性猛然增加。

生活和个人安全水准在此期间的急剧恶化,带来了民众巨大的生存压力、紧张和焦虑。戴维斯认为,在社会进程中,经济繁荣会提高大众期望值,如果随后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会把这种期望值粉碎,大众就会产生被剥夺和攻击感^[21]。而在一个充满了不确定和恐惧的时代,巫术迫害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人们不幸和灾祸的意识形态、调节斗争与冲突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矛盾的转移点。紧张情绪迫切需要人们通过某些事件来缓解。巫术迫害作为缓解压力方法的优点是它作为一种可见的具体行动,使人们相信一切灾害都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他人阴谋,它以直接参与方式来疏解人们的敌意、愤怒以及罪恶感,是一种可以让人摆脱令人不适、不能维系的关系而不会产生罪恶感的方式^[22]。这也印证了社会学关于人们处于长期重压下,如物质匮乏、疾病、战争或是令人恐惧和无法控制的天气变化,就可能导导致集体行动的假说。在此种形势下,人们维持着表面的同类关系,而一旦有人被鉴定为问题所在,对其采取行动即可解决问题。巫术迫害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大众心理歇斯底里的集体行为。

寻找替罪羊无疑可以慰藉部分人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为罪恶提供了释放点。如加泰罗尼亚1618年粮食歉收后,女巫发现者就声称发现了200名女巫^{[1]198}。1580—1590年间特里尔发生的巫术迫害也是发生在连年歉收之时。同样,1644年法国西南地区从勃艮第到香槟发生了霜冻和冰雹,人们也归咎于巫师:“勃艮第绝大多数城镇和村庄都因为女巫导致天气异变的谣言而陷入恐慌,谣言认为正是因为她们的诅咒导致了冰雹毁坏谷物,霜冻弄死了葡萄……”^{[1]202}

最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心理渴望或焦虑及其“拒绝—内疚综合症”。

要指出的是,替罪羊理论并非具有普适性,另一种心理解释则显示了其在解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巫术迫害方面的优越性,即巫术反映出人类深层次的渴望或者焦虑。布里吉斯指出,巫术整合了我们共有的幻想生活中的某些元素,来表述我们某些最深层恐惧,并且表达我们对他人潜在的怀疑^{[1]3}。也就是说,巫术是古代民间传说和日常恐惧的混合物。社会变迁会带来压力和忧虑,而这些会被带入到群体关系中,当没有一致办法来调解时,敌意就可能在群体中或不同群体间爆发。

英国学者布里吉斯认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摩擦需要平衡,而社会巨变和经济压力压倒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和实践活动,带来社会价值观等的巨变时,出于对失去自身地位和安全的恐惧,一些群体和个人为保护自身,拒绝了传统的社区互助义务,从而带来社区内冲突和自身的巨大精神压力,尤其是当自身发生不幸时更是如此^{[1]146,287}。而大部分人生活困难使传统乡邻间的互助互济义务淡化,乡邻关系更趋恶化,也会带来焦虑和紧张。贺斯莱也认为:在社会紧张状态期间,通过巫术审判诱使农民们把大部分不适归罪于巫师,并能摆脱看起来是负担或令人厌恶的社会分子^[23]。为缓解压力,广泛存在的民间信仰就会和人性恶念相遇,人们就会在下意识怨恨的驱使下,将怀疑和恐惧锁定、投射在特定者身上,从而在心理上表现出一种不自觉的防御机制并构建起一种将他人视为恶毒者的观点而产生攻击。也就是说,巫术迫害常常是由日常生活中诸如邻里争吵之类导致的一些微妙变化驱动的。例如克劳顿控告詹

农案,起因是克劳顿禁止詹农的鹅进入其牧场并驱赶鹅(此前一天詹农路过克劳顿马群时,一匹马跌倒并很快死亡),詹农说出了你将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后悔之类的话语,随着又一匹马的暴毙,巫师指控很快到来;雷蒙德控告芭比林案,起因是雷蒙德为牟取更大利润而不再向芭比林出售牛奶,而后者仍要购买,遭拒后,前者失去了所有奶牛和数头公牛;阿农巫术案中,她被控杀死了屠夫蒙津,原因是他拒绝让她赊购肉^{[1]152,156,160}。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大众信仰和社区紧张的混合产物,是社会压力的表现,而受害者中的多数人仅仅可能是因邻里关系不睦。而在巫师自供问题上,我们也可以读出某种心理暗示,它是巫师是其受到所在群体排斥和诋毁后某种形式的自我净化,希望被谅解并回归群体^{[1]61}。

三

巫术常常被视为一种反文化或社会失范现象,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隐藏在巫术迫害这一集体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发生机制。一般说来,集体行为的出现必须具备结构有利条件、结构性紧张、一般化信念的增长和扩散、突发因素、参与者行动的动员等要素^[24]。

首先,结构的有利条件。17世纪欧洲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剧烈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会给生活在其间的欧洲民众生活带来某些代价,从而为巫术迫害这一集体行动的产生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结构条件。

其次,社会变迁导致的结构性紧张。社会变迁给生活在其间的欧洲民众日常生活带来沉重的心理代价:压力和忧虑,而这些压力和忧虑随着社会网络生活的加强当然可能会被带入到群体关系中,从而引起结构性紧张。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并衍生出各种对社会和他人的紧张、焦虑、怨恨与不满情绪。巫术迫害即来自于各种异常的心理状态,例如相对的剥夺感、挫折、紧张、忧虑、不满等。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致办法来调解这种结构性紧张时,敌意就可能在群体中或不同群体间爆发。

再次,突发的气候变化这一因素的有效参与。17世纪突然的气候变化让西欧人陷于普遍的贫困状态,进而让普通民众形成某种共同心理,包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以及共同的愤怒。而气候引发的欧洲社会各个层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强化了民众的心理异常,让本已存在于民众内心深处的传统文化中对巫术的一般性的信仰和由此带来的心理暗示迅速得到强化和扩散。这进一步推动了巫术迫害运动的产生。

最后,参与者的行动动员和组织,让行动走向成熟。17世纪,巫术迫害这一将各种不满和忧虑转化为行动状态和集体状态的社会运动,经过王公贵族、教会官员等社会上层精英、政府部门以及专业猎巫者所进行的推波助澜式的有效资源动员和组织,掺杂着各方利益的争夺和人性恶念的巫术迫害运动就成为民众心理愤怒的排遣口,即所有的不满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发泄对象,也使得迫害群体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官方支持,进而凭借公共权力来维持他们自身的各种权益,并逐渐走向行动上的成熟。

总之,17世纪欧洲巫术迫害心理成因折射出这一期间各种社会压力与刺激是怎样转化为欧洲民众深层次渴望、焦虑以及需求并通过民众中广泛存在的巫术信仰来实施巫术迫害进而掩盖、实施其愿望的种种举动的;揭示了特定历史情景下一个相对隐形的反面社会文化所特有的思想基础以及围绕在巫术问题周围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问题;揭示了巫术与近代欧洲社会诸多特征是如何建立起联系及其交叉作用的方式。一言以蔽之,17世纪巫术迫害行为的心理发生机制,从微观上体现了集体行为的某种心理和文化取向,反映出巫术迫害运动行动者的日常生活体验,如个体的怨恨、不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共同信念、集体认同的产生和建构过程。

[参考文献]

[1] [英]罗宾·布里吉斯. 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M]. 雷鹏,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 [美]布瑞安·伊恩斯. 人类酷刑史[M]. 李晓东译.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175.
- [3] Rossell Hope Robins. *The Encyclopedia of Witchcraft and Demonology*[M]. New York:Crown Publishers,1959:35.
- [4] 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1969:150,156.
- [5] 董进泉. 西方文化和宗教裁判所[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07—108.
- [6] Marc Bloch. *The Royal Touch: Monarchy and Miracles in France and England*[M]. New York:Dorset Press,1989.
- [7] Joseph Klaitz. *Servants of Satan; the Age of Witch Hunts*[M].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33.
- [8] 孙义飞,尹璐. 17世纪西欧气候变迁与粮食供应危机[J].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9(2):12—13.
- [9] Geoffrey Parker and M. Smith.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97:8.
- [10] Sheldon J Watts. *A So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1450—1720: tensions and solidarities among rural people*[M].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1984:21.
- [11] N Peter Stearns. *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sixth edition)* [C].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1:284.
- [12] Joseph Berg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 1598—1715*[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1.
- [13] [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 西方世界的兴起[M]. 厉以平,蔡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32,144.
- [14] [美]杰伊·罗伯特·纳什. 最黑暗的时刻——世界灾难大全[M]. 沈愈,郭森,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98—599.
- [15]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M]. 顾良,施康强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2.
- [16] J D Vries.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M].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8.
- [17] Henry Kamen. *Early modern European society*[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25.
- [18] A L Beier. *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M]. 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3:32.
- [19] [意]卡洛·M·奇波拉. 欧洲经济史:第二卷[C]. 贝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80—81.
- [20] 孙义飞,王晋新. 多元化、多样化、拓展化与开放性——西方学术界“17世纪普遍危机”论争及其启示[J]. 安徽史学,2006(1).
- [21] James C Davies. 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J].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Vol. 127, 1962:5—19.
- [22] Thomas Schoeneman. The Witch Hunt as a Culture Change Phenomenon[J]. *Ethos*, Vol. 3, No. 4, 1975:534.
- [23] [英]爱德华·伯曼. 宗教裁判所:异端之锤[M]. 何开松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98.
- [24] 冯建华,周林刚. 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四种取向[J]. 国外社会科学,2008(4):49—53.

Psychological Causes of the European Witch-hunt in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SUN Yi-fe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In Europe, there was a huge Witch-hunt movement in the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1580—1700). Research indicates, as a kind of collective behaviors, it has complicated motivation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caus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t is composed of psycho-hint from the tradition culture; search for scapegoat; psychological syndrome of refusal-guilt, etc.

Key words: Witchcraft; Witch-hunt; Psychology; Long Seventeenth Century

[责任编辑:赵红]